

空间经济：

集聚、贸易与产业地理

梁琦等著



科学出版社

空间经济：集聚、贸易与产业地理

梁 琦 等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3&ZD16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285)

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30171110043)

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GXS4D094)

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关项目(2012ZGXM_0001)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基于空间经济研究的基本理念,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从区域、国家与国际三个空间层面,分析产业地理变迁的若干动因及其作用机制。在区域层面上,以广东为例,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考察要素集聚对区域产业地理变迁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上,从产业集聚形态变化的角度,通过考察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轨迹,分析中国产业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并从劳动力流动的角度,探索要素流动对缩小地区差距的影响;在国际层面上,分别研究了生产分割和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的关系,重点关注国际专业化分工与贸易开放对我国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

本书适合所有对空间经济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经济:集聚、贸易与产业地理/梁琦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3-040918-8

I. ①空… II. ①梁… III. ①区位经济学-研究 IV. ①F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0482 号

责任编辑:徐 倩 / 责任校对:朱光兰
责任印制:阎 磊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骏杰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 3/4

字数:196 000

定价: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产业地理变迁的若干动因	12
第一节 集聚经济	12
一、自然优势	12
二、共享机制	13
三、政府干预	14
第二节 要素流动	15
一、DCI 框架	15
二、OTT 框架	17
第三节 分工与专业化	19
第四节 对外贸易	20
一、贸易开放与产业区位选择	21
二、贸易开放与比较优势	21
第五节 小结	22
第三章 区域产业地理变迁：以广东为例	24
第一节 要素集聚与产业地理	24
第二节 广东产业地理变迁的三个阶段	26
一、第一阶段：单中心-外围结构	27
二、第二阶段：双中心-外围结构	32
三、第三阶段：多中心-外围结构	36
第三节 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模式的影响因素	40
一、历史地理	41
二、政策制度	42
三、市场因素	43
四、知识进展	44
第四节 小结	44
第四章 中国产业空间结构演变：专业化与多样化	47
第一节 专业化与多样化	47
一、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含义	47

二、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发展	48
第二节 指标设计与分析方法	51
一、主要指标说明	51
二、非参数分析法	53
第三节 中国专业化与多样化的空间分析	53
一、全国总体情况	54
二、各省份的情况	58
三、我国产业集聚发展阶段性演进的影响因素	66
第四节 国际比较及发展趋势	73
一、国际比较	73
二、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75
第五节 小结	77
第五章 生产分割与产业地理	78
第一节 生产分割与产业区位	79
一、生产分割背景下的产业区位变化	79
二、生产分割与长三角产业区位	80
第二节 生产分割、跨国公司与专业化模式	84
一、跨国公司在欧洲的区位决策	84
二、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和跨国公司的作用	87
三、生产分割与中国专业化模式	88
第三节 生产分割与中间产品贸易	91
一、生产分割与中间产品贸易的理论研究	91
二、生产分割下的贸易模式	92
三、发展生产分割与中间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和意义	95
第四节 小结	96
第六章 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空间结构	98
第一节 劳动共享与产业空间结构	99
一、厂商规避风险的区位选择	99
二、供求竞争下厂商的趋利定位	99
三、经验研究	101
第二节 劳动地理集中、产业空间与地区差距	107
一、劳动地理集中的经验与现实	108
二、劳动地理集中与经济发展	110
第三节 小结	112

第七章 贸易开放与产业地理	113
第一节 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空间分布	113
一、对外贸易与空间经济的关系	113
二、产业空间分布的理论解释	115
三、对外开放与中国的产业空间分布	116
第二节 中国的贸易开放与空间特征	117
一、贸易开放的程度：贸易成本	117
二、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与空间特征	118
三、贸易成本测度的价值与意义	123
第三节 贸易开放对空间发展差距的影响	123
一、贸易开放与区域发展	124
二、贸易开放、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	125
第四节 小结	128
第八章 结束语	130
参考文献	135
附录	142
后记	148

第一章 导 论

空间经济研究范畴广袤，内容庞杂，本书着重研究产业地理和空间经济格局。但无论是哪种尺度的区域空间，其产业地理与空间经济格局都随时间的发展而异彩纷呈，不断变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理念。^①

（一）研究空间问题要有历史观

经济活动最典型的地理特征是集聚。空间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特定的产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是历史和偶然事件的影响、循环累积的自我实现机制或预期的作用。历史和偶然事件是产业区位的源头，循环累积过程则产生如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被锁定在某个地区。

历史是物质的，需要时间去沉淀和累积。从哲学角度看，时间就是变化本身，因为时间的存在才有了运动，时间是物质的，它就是运动本身，描述一个物体，仅从空间来描述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认为物质都是运动变化的，而造成运动变化的是时间，如果没有时间，一切都不存在，时空就瓦解了，也就没有了物质。因此，我们研究空间问题，必须要有历史观，研究产业区位问题，必须要有时空观，即必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同时考察。

看看我们身边的每一个生产要素集聚地，无一不存在历史的渊源。也许人们看到某些地方的集聚源于偶然性，但历史恰是在诸多偶然性中展开的。假如当年邓小平同志不是在“南海边”而是在“东海边”或者中国版图的其他某个地方“画了一个圈”，深圳就不会从30多年前的一个小渔村成长为今天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线城市（梁琦，2005）。而为什么当年邓小平同志是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呢？人们可以说出方方面面的原因。地理学家有地理学的解释，政治学家有政治学的解释，社会学家有社会学的解释，经济学家有经济学的解释，历史学家有历史学的解释，军事家或许还可以从军事方面考虑，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其道理，偶然性中蕴含着必然性，这就是辩证法。但最终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深圳，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

产业区位和区域发展有其历史规律，这里的历史既包括人文历史，也包括自

^① 本章主要内容来自梁琦（2010）。

然环境史——自然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须臾不可分（梁琦，2007）。譬如，上海地处中国南北海岸中心点、黄浦江与长江汇流处，自春秋战国以来；2000多年的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我国第一批通商口岸，孕育出自由开放的环境，至20世纪初已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的金融贸易中心。改革开放初期，受政策的影响，上海发展速度相对滞后于广东等先行开放地区。但随着1990年浦东的开发开放，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经济重心北移，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经济圈迅速崛起，上海作为龙头城市不断提升其作为国际经济、金融与贸易中心的地位。2013年，新一代领导人又在“东海边”的这个城市设立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将成为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提升上海的国际竞争力，并对中国空间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二）研究经济问题要有空间观

经济增长具有地理因素。地理影响增长，增长影响地理。

地理影响增长，可以从两大方面来看。一是自然地理和环境历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积累循环的因果关系改变厂商的空间分布导致地理集中，而地理集中将改变成本进而影响到增长速度：知识的地方化溢出可以改变创新成本；上下游关联可以改变交易成本；地理位置可以改变运输成本。

增长影响地理，也至少有两大方面被经验证明：一是因为增长通过创新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二是增长迅速的地区吸引大量的可流动要素并改变相对市场规模。

并且，地理与增长的互动是通过集聚实现的（梁琦，2009）。由于城市是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地，而且城市越大，集聚的生产要素的优质度越高。因此，城市的增长大于乡村，大城市的增长高于小城市。为什么大城市生活成本（如房价）如此之高却还是有那么多“蜗居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今世界收入的最佳预报器不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也不是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而是他工作的地方。

增长给人们带来福利，而地理则是关系到人们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但地理是有双重内涵的：其一是它的自然性，其二是它的经济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要有“可持续发展”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于是我们不再提倡“战天斗地”、改变自然；相反，要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自然地理是无法改变的。但是，经济地理则是可以改变的。而政府在改变经济地理方面的作用显然要比个人大得多。这说明，政府干预市场必须要有空间观。政府可以在资源空间配置上弥补市场的失灵。

(三) 地理毗邻效应：“近朱者赤”

既然地理因素对人们的福利水平如此重要，而生产要素有逐利性，在没有更多要素流动壁垒时，无疑生产要素会从报酬低的地方流向报酬高的地方。富裕地区的生产要素报酬高，因而也是生产要素集聚地。集聚中心与外围吸纳生产要素的速度各异，直接导致了收入在地理空间上的不平等分配。那么，毗邻富裕地区，也即是毗邻大市场，是一种天生的机遇，是一种幸运，而毗邻贫困地区则刚好相反（世界银行，2009）。为什么郊区比山区富裕，因为郊区毗邻城市。富国周边很少有穷国，因为邻国之间不仅共享政治边界，在经济上也息息相关。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也很少任其周边地区深陷贫困而坐视不管，它的繁荣迟早会惠及周边，繁荣如知识一样也有溢出效应。

地理毗邻效应的第一个启示是，中心-外围的地理结构是有圈层的，城市体系结构也是有层级的；无论地图上的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其内部发展都不可能是绝对平缓均匀的。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常态，在一个国家内部，区域间不平衡发展也是常态，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提前着手平衡经济增长的努力只会阻挠发展，反而是得不偿失的。

地理毗邻效应的第二个启示是，经济的非均衡性和循环性使得落后地区赶超富裕地区存在着重重困难，但溢出效应带来的希望远远大于困难。对于我国相对比较落后的一些中部地区，应该挖掘地理毗邻优势，通过毗邻东部而迈向世界大市场。例如，湖南地处内陆，但通过泛珠江三角洲（简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州交易会，简称广交会）等平台，使得外资在长株潭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在湖南引进的外资中，港台资金就占据大半壁江山。

(四) 赢者无界：“毗邻”意义的拓展

前面说过，与富裕地区也就是大市场地理毗邻有“近朱者赤”的天生毗邻效应，那么对于没有地理毗邻的地方，又该如何发展呢？这就需要将“毗邻”的思路加以拓展。

第一个拓展的思路是，“毗邻”不只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也是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因此，虽然自然地理无法改变，但是经济地理是可以改变的。

闻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为历代漕运要道，对中国古代南北经济交流和发展曾起到重大作用，成就了当时富甲江南的扬州，更使小小的直沽寨迅速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天津卫”。再看北宋时最繁荣的开封后来渐渐没落，如今已不及与它自然地理条件类似的郑州，不能不说这与经济地理条件的改变是分不开的：虽然陇海铁路穿越开封和郑州，京广铁路却与开封无缘，而正是京广铁路成就了郑州南北枢纽的地位，完全改变了

郑州与开封在中国的相对经济地理地位。

因此，为了更接近大市场，改善基础设施，从而缩短距离，减少距离成本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为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而建设的地区间高速公路和铁路，为加强信息流动而改进的通信技术。事实上，四通八达的更迅速、更便捷的交通运输系统和信息交流系统与中国经济崛起和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计划几年内在全国建成以北京为中心的1~8小时铁路交通圈，这就是一种地理空间一体化的战略，将大大改变中国经济地理格局。

第二个拓展的思路是，“毗邻”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市场意义上的。不利的地理条件降低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从而增加了经济距离，而经济的一体化可以缩短经济距离。经济一体化就是减少经济壁垒，强化市场准入，而对市场准入而言，距离的衡量尺度应该是经济含义上的，而非几何含义上的。推进经济一体化需要制度的保障。中国近年来对外区域合作政策有了重大发展，从以往只注重开放的地区主义转变为同时重视制度性的区域贸易安排。国家近年来对内的区域经济政策及近来陆续批准的一系列区域规划和区域性文件，都是从制度上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

（五）中国空间经济结构的标准化：多层级的中心-外围结构

中国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应该是多层级的中心-外围结构。在空间经济结构中，杜能（Thünen）的单中心城市结构（包含了工业与农业的分布规律）构成标准空间经济结构的基本单元，多个基本单元支持一个次经济中心，几个次经济中心支持一个更高级经济中心，最高级经济中心包含多个次级经济中心；任意上下两级都是一个中心-外围结构。

多层级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原因有：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有效经济规模，其服务的市场半径大小不同；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市场潜力，市场潜力大的区域，产业集聚的规模也大；一些外生因素（如财政转移等）使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购买力（需求因素），购买力高的区域（如行政中心等）产业集聚规模就大，等等。而引起产业规模经济性、运输成本、市场潜力和需求变化的一切因素都会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变化，自然地理因素、社会基本制度（如行政区域的划分、税收的征取与使用方式等）可能导致实际的空间经济结构偏离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

放眼世界，对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都只是经济历史长河中的某个均衡点，任何一段时期内的空间经济结构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偏离。偏离是常态。正是这种偏离的特性，才诱导了生产要素的流动。而生产要素为何流动（原因）和怎样流动（流动的方向和速度），正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的主线。空间经济学的作用显而易见。而它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更甚于其他小国。

（六）新国际分工与空间经济新模式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技术的进步，使各国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一体化生产工序的国际分割和产业集聚并存的现象颇为引人注目。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国际通信成本大幅下降、运输成本减少、金融服务更加便利和低成本、各国间相互了解有所增加，将原来在单一企业内进行的一体化生产配置到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成为可能，生产活动趋于分散。另一方面，由于要素禀赋效应、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厂商间“需求-成本”关联等效应的存在，生产厂商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集聚又成为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这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生产的跨界扩散和集聚并存，全球性生产活动的分散伴随着生产活动在少数国家的集聚。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隐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生产分割为产业集聚提供了新的研究和解释角度。

在生产分割这一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一体化生产过程被分开，各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区段分散到与其要素禀赋相适应的地区或国家。为了寻找最佳的生产区位，原属于不同产业的相近工序逐渐集聚到一起，一体化生产过程在分散进行的同时形成了相似生产区段的集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和集聚模式，生产分割对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认为，从生产分割这一新的角度研究产业空间区位的决定和改变，探讨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新发展，对中国未来产业和地区的战略调整有重要的前瞻意义。

（七）集聚的性质与形态：专业化与多样化

要素禀赋丰裕的产业条件，毗邻效应导致的运输成本降低、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本地市场效应导致的本地需求扩大与规模经济，上下游关联优势导致的贸易成本降低等，构成产业集聚的向心力。不可移动要素的稀缺性、拥塞效应、距离产生的高运输成本和市场分割等，则促使分散生产更加经济，形成产业集聚的离心力。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对大小决定了产业是趋于集聚还是分散，而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差距大小将决定产业集聚或分散趋势的快慢（Fujita et al., 1999）。

集聚是空间经济分布变化的一个动态概念，是生产要素朝一个方向流动的动态过程。但是，在任意一个时点上，它也包括静态含义。产业的分类有粗有细，按统计口径有大类、中类、小类之分，或二位数、三位数、四位数的区别，如此等等。锁定某一分类级别，产业集聚就可以划分为单产业集聚和多产业共聚，分别对应着专业化与多样化。从集聚的经济效应来看，单产业集聚导致地方化经济，多产业共聚形成城市化经济；从集聚的动态结果来看，单产业集聚表现为专业化的产业集群，多产业共聚显示为多样化的城市经济。

在空间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除非研究特定的产业集群，通常所说的集聚都

具有多产业共聚性，因为无论哪一种产业分类法，单产业集聚在更低一级分类上看就是多产业共聚了。即便是产业集群，在更细的产业分类上，也是多产业共聚体。区分单产业集聚和多产业共聚，从根本上来说，其实是对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探讨。

专业化与多样化都促进创新与发展。专业化的城镇经济和多样化的都市经济共同支撑着我国的多层级中心-外围结构。尤其在当前，相比工业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是滞后的，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专业化的城镇经济和多样化的都市经济同等重要。

（八）空间竞争：空间产业组织与空间市场结构

在空间经济研究中，假设厂商具有无限的规模经济，那么，一个厂商在一个区域组织生产一种产品是最为经济的，市场上只存在同类可以近似替代的产品之间的竞争，而不存在相同产品之间的竞争，即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即便不用厂商具有无限规模经济这一假设，空间市场结构也是不完全竞争的。用微观经济学眼光来看，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是无差异的，而空间本身就是产品差异性的一种，所以，空间经济学完全排斥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即所有的空间市场结构都是不完全竞争的。

在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的假设下，差异产品之间进行“张伯伦竞争”。通过市场容量与单个厂商的最佳生产规模之间的比较，某一特定产品市场也许能够容纳多个厂商，这些厂商之间将进行“古诺竞争”和“霍特林竞争”，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之间的相对大小将决定多个厂商是彼此靠近还是离散式分布（既避免竞争又获得一定的集聚租），但是不会均匀分布。如果生产某种产品的厂商具有有限规模经济，那么，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相互作用构成产品的有效供给半径或集聚阴影。随着空间距离超过集聚阴影，对于新市场的供给，要么由一家新厂商来承担，要么原厂商开设一个分工厂（厂商的空间碎裂），拥有多个工厂的多个厂商将在整个地理空间内展开各种形式的竞争。

由于经济空间典型的集聚特性，行业规模经济、上下游关联、专业化劳动力、生产型服务投入以及知识的溢出效应，促使同一产业的许多厂商集聚在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因此产业的空间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结构，单个厂商是经济主体，空间经济学同样研究市场结构，经济主体更多的是集群而不是单个厂商。集群与集群之间的竞争形成空间市场结构。在集群内部，厂商之间的竞争几乎没有空间差异，可以忽略空间特征。而在集群之间的竞争中，空间是最重要的差异。

空间竞争方式对于不同的产业集群具有不同的利益，利益得失会促使产业集群倾向于通过寻租来影响区域贸易和产业政策，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产业集群在

一个区域的经济位置和产业集群内部的协同战略,往往致使寻租行为取得预期效果,从而会导致区域保护主义滋生。而单产业集聚是以贸易为依托的,因此地方市场分割又恰恰是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

(九) 劳动力流动与空间经济协调

在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中,区域发展不均衡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瓶颈,与之相应的是,空间经济的差异化发展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贯彻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如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开放性的角度思考差距形成的原因,寻找地区协调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因素中,要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流动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力流动及其地区分布对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及地区差异有重要的影响。劳动力流动在不同机制的作用下具有两个方面的效应。

其一,要素流动和要素集中在制造业本身的规模经济、收益递增、关联效应等特性存在的前提下会产生持续的循环累积效应,推动经济的空间集聚,在集聚中心得到优先快速发展的同时,容易形成与外围地区间的差距。

其二,劳动力流动也会导致产业在空间上的扩散。其基本的演化过程和机制是: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布一旦在某个地区形成了集中优势,将使该地区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强化,地区之间的工资差距会不断扩大,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集聚区内的厂商就有动力在另一个地区建立新的企业,新的地区又开始发展自我强化优势,导致工资的上升;一段时间后,第三个地区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以此类推。

这种演化机制为产业转移和产业扩散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集聚中心向外围地区扩散有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有助于实现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这两种效应的存在为研究产业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十) 集聚与分散:中心向外围的转移

集聚会形成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导致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经济增长相对较快的地区吸引生产要素的流入和产业流入,促进了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使资本预期利润率上升,并导致经济增长率上升。在这种集聚式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增长的外溢效应,外围地区的福利水平增长率也严格优于非集聚状态下的水平。因此,集聚与整个中心-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的。

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受到流动要素供给弹性和外部需求的约束。流动要素供给弹性大,可以支持中心区域高速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供给弹性小,则集聚与增长的速度缓慢。若集聚以贸易为依托,外部需求的变化将引

起集聚速度和强度的变化。

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也受到不可流动要素稀缺性的约束。随着不可流动要素价格的持续上涨，集聚中心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产业升级，否则两者都将停滞。当集聚达到一个阈值时，中心向外围的适度扩散是必需的。我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东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产业集聚中心、外商直接投资（FDI）集聚中心和进出口贸易集聚中心，今天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一方面是积极与国际产业链接轨，培育参与国际竞争的高阶产业、逐步淘汰低价产业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集聚的拥塞效应的作用，使得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提高，促进了产业分散。

产业分散带动了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产业转移也有空间半径问题。近年来广东、江苏这些省份的产业转移，就多半发生在省内，这其实也是毗邻效应。一方面，我国大多数省份本身就存在中心-外围结构并形成了地区间差距，省内也有地区间平衡发展的问题，如广东省的珠三角与外围，江苏省的苏南与苏北。另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大大不如从前，劳动力的转移正从过去的“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再加上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势头迅猛，而劳务输出则明显放缓。这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特点缩小了产业转移的空间半径。

（十一）总部中心集聚与工厂分散转移：企业的空间理论

现实中，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得厂商将生产工厂转移到成本更低廉的地区，出现生产分散的趋势；而知识、技术、交流成本和其他服务又促使公司总部向中心城市集聚。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不断争夺公司总部、制造工厂，企业综合考量不同地区的运输成本、交流成本和税收政策，选择最优的区位。

已有的经验事实表明，不管总部集聚区的地方政府采取何种税率，只要外围地区税率持续下降，在总部集聚区设厂的公司利润将会降低。但在异地设厂成本上升时，更多的厂商将趋于在总部集聚区设立工厂，以降低过高的交流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对公司总部选址的影响较小，而对制造工厂选址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当然，这都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现实中，类似的故事不断在中国出现。一方面，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大量企业开始选择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内地省份设立制造工厂，以获得较发达地区更为低廉的非技能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使用成本。另一方面，许多内地企业，尤其是较大规模的企业，选择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转移公司总部。雁阵理论告诉我们，产业的空间梯度转移在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协调地区之间的发展。

（十二）经济一体化、统一大市场：中心与外围的博弈

经济一体化使得要素与产品流动更加自由，为产业集聚提供保障，加速集聚中心的发展。尽管存在毗邻效应、溢出效应和转移效应等，但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使得中心地区能比外围地区获得更多经济一体化的利益。

从一国内部来看，实行经济一体化战略将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促进要素与产品流动，降低贸易成本，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因此，对于落后地区，实施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一个“理性选择”。在中国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为维护地方经济利益而设置的区际贸易壁垒。

所以，经济一体化和统一大市场是中心与外围的博弈。短期来看，博弈的稳定均衡是适度的一体化和地方保护主义并存；长期来看，这种“理性选择”是“非理性”的。前面说到，多中心-外围结构是我国空间经济的长期趋势，而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具有多方面的益处，如有利于促进区域分工，形成多个大的产业中心；有助于形成区域间的相互需求与供给，支持整体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以更强的力量参与国际竞争等。

（十三）对外贸易重塑国内经济地理

以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为特征的经济一体化是塑造国内经济地理的重要力量。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识到全球或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能够给本国带来好处，从而积极参与到各种类型的一体化协议中。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最基础、最原始的内容当属贸易的开放（如取消关税壁垒）。以贸易开放为特征的对外一体化对国内的经济地理具有复杂的影响，它不仅会影响国内企业的绩效行为和产业的空间分布，还会对国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产生影响。贸易开放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国内企业市场规模，为了获得更多的国外市场份额，企业选择在贸易便利的沿海地区进行生产；生产的内部规模经济内在地驱动着这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而实现规模扩张，外部规模经济又促使这些企业集聚在同一个地方，各因素之间相互强化，因果循环，这样推演的唯一后果就是，沿海地区成为产业集聚区。

产业集聚区内的企业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成为国内发展较快的中心地区，其他地区则为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于是，在贸易开放的同时，地区发展不均衡相伴而生。类似的集聚趋势会随着时间和开放度的深入而变化，最终，贸易开放促进了人口的合理分散化、特定产业的空间集聚以及地区生产专业化，从而在生产集聚的同时，实现不同地区生活水平的趋同。生活水平的趋同意味着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但要通过贸易开放实现这种均衡需要其他制度和政策予以保障。

(十四) 效率、公平与最优集聚：空间经济政策对市场的补充

市场机制对资源的空间配置是效率充足,“看不见的手”使经济资源在各区域、各行业之间的配置达到边际回报均等化。但在规模经济普遍存在的当今时代,市场对资源的空间配置往往在实现边际均等时,却导致总量的失衡。市场机制使得产业空间分布出现内生的不平衡,集聚中心与外围区域存在发展差距;持续的发展差距在累积循环作用下导致区域福利水平的严重失衡。因此,市场机制不能够保障空间公平。

最优产业集聚理论表明,在经济自由化的前期,市场机制导致过度集聚,在自由化的后期又呈现集聚不足。最优的集聚规模应该是在“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下,实现多个区域协同发展。

当前区域不平衡发展是中国持续健康增长的一个瓶颈。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难以实现区域优势的充分发挥,使得各区域之间产业关联度较低、相互需求额较少,从而使得发达地区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而落后区域则缺乏促进产业高速发展的条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始终依赖外部需求促进和维持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资源的空间配置如果单由市场主导,集聚和自演变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就是必然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有政府的干预与调控,通过空间经济政策对市场机制进行补充。从区域贸易政策的角度来看,打破地方市场分割、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将促进产业集聚,导致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就需要结合各地的禀赋状况实行一些微观产业政策协调地区分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从财政税收政策的角度来看,税收的征取与支出方向会促进产业集聚,因此向欠发达地区进行财政转移能够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步调,减小发展差距。从基础设施投资的角度来看,加强便利区域间贸易的基础设施建设将促进产业集聚;而提高欠发达地区内部便利贸易的基础设施投资和便利区域间技术交流的基础设施投资,将促进欠发达地区培育新产业,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从区域金融的角度来看,增加欠发达地区的融资渠道、放宽欠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贷款条件等措施,都将促进落后区域的产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題。例如,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2012年,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为10:6.3:5.0,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3: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固化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大量劳动力异地转移就业。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超过2.6亿人,但由于体制和政策的制约,绝大部分流动人口还不能本地化,带来许

多负面效应。各地区按行政区扩大经济总量，出现盲目开发的倾向，一些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力，工业遍地开花，城市盲目布局，土地无限开发，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切使得我国优化经济结构与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十分迫切，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需要协调发展。如何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使多彩的“中国梦”更加和谐美丽，科学发展是始终必须坚持的原则与路径。

本书从集聚经济、生产分割、劳动力流动与国际贸易等角度，比较深入地研究经济活动空间特征与规律，全书分为7章。第一章为导论，首先提出空间经济研究的基本理念和现实问题，然后说明本书的选题背景与基本内容，以便读者迅速了解本书的逻辑思路。第二章在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对产业地理变迁的若干动因（包括集聚经济、劳动力流动、专业化与分工、生产分割与对外贸易等）进行概括性的分析与说明。第三章以广东为例，从历史地理角度，以要素集聚为主线研究我国省级区域的产业地理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格局演变的规律和成因。第四章基于产业集聚形态的变化，通过考察专业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轨迹，分析我国产业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从而揭示国家层面产业地理的演化机理及规律。第五章在国际层面上，从产业区位、专业化模式、中间品贸易等方面分析生产分割与产业区位调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专业化模式对产业地理的影响。第六章从要素流动的角度，研究了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空间结构的关系及其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探讨了要素流动对缩小地区差距影响的开放性思路。第七章从对外贸易的视角，阐述了贸易开放与国内产业地理的关系，重点分析了贸易开放条件下国内产业空间的特征，以及贸易开放对空间发展差距的影响。本研究既可为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实践注入新的内涵，促进空间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推动资源空间配置理念深入人心，又可为我国优化经济空间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支撑。